

西北散記

斯邱
著
諾瑾
譯



漢口羣力書局出版

西 北 散 記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斯 諾
譯 者 邱 瑾
出 版 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發 行 者 漢口羣力書店
漢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經 售 處

重 慶

北 新 書 局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宜 昌 新 生 圖 書 公 司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漢 口 黎 明 書 局
江漢路喇保里十二號

蕙新西街二十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目次

- 一 抗日大學參觀記…………… 1
- 二 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劇…………… 10
- 三 「小鬼」——少年先鋒隊…………… 24
- 四 紅軍戰鬥員的生活…………… 37
- 五 保安生活散記…………… 47
- 六 紅軍唯一的外國顧問…………… 53

65999

抗日大學參觀記

抗日大學在未改組以前，稱爲「紅軍」大學，其中有許多事情，都是空前未見的。

校長是位廿八歲的青年軍事領袖，據說他從來不曾打過一次敗仗。校中有一班修業生，都是久歷沙場的戰士，年齡平均廿七歲，作戰經驗平均八年，受傷平均三次。有那一個學校，因爲缺乏紙張而把敵人宣傳品紙張的空白邊當作練習簿的？有那一個學校的學費，包括膳宿制服及其他一切雜費在內，只要十五元大洋一月的？然而「紅軍」大學却竟然如此。

•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全世界高等學府所未有的，那就是把窟洞作爲課室，把磚石作爲課桌和座椅，把石灰泥土築成的牆壁作爲黑板，把全部校舍築在絕對不受炸彈轟炸的地方。

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呢？因爲在陝甘兩省，除了普通房屋以外，還有許多幾百年前遺留下來的窯房、佛窟、和堡壘。這種古怪的住所是從前有錢的官吏和地主築來防備水災、飢荒、和外族侵略的，所以裏面還有儲藏糧食和財寶的地方，足夠應付被圍期內的享用。那些圓頂的房間，多從堅硬的岩石中挖出來，有些挖得很深，足可容納好幾百人，而且完全受不到炸彈的攻擊。「紅軍」大舉便把這些古代的采地，作爲安全舒適的怪校舍。

我到達不久，就有人介紹我見校長林彪，他邀我對學生講演一次。他出了一個「英美對華政策」的題目。我很有些躊躇，因爲對於這兩國政策，我知道的並不多，此外，我又沒有能力用馬克斯主義的術語來闡發。但林氏却竭力要求。他說他們自己會用馬克斯的術語來配合上去的。他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掛麵飯」，我在感激之餘，自然不得不勉爲答應了。

林彪是河北省一個工廠主的兒子，生於一九〇八年。他的父親因爲不堪苛捐雜

我的勳業而破產。但他却得在大學預科畢業而考取了廣州黃埔軍官學校。他在那裏的成績非常出色。並且在蔣介石校長及蔣氏主要顧問加侖將軍的指導之下，學到了高深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他畢業不久，「北伐」就起來了，於是他升為上尉，到了一九二七年，正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又升為張發奎部下第四路國民革命軍的上校。是年八月，國共分裂，他率領他的隊伍加入了賀龍和葉挺所指揮的二十路軍，從事南昌暴動。

林彪與毛澤東，同為「紅軍」之中少數從未受傷的兩個領袖。他在前線身經百戰以上，在沙場指揮十年有餘，其勞苦奮勇，為部下人人所熟知。

一九三二年，林彪被任為「紅軍」第一軍團的軍長，當時該軍共有來復鎗二萬支。他們是「紅軍」之中最精銳的部隊。第一軍團之所以能百戰百勝者，多半由於林氏超特的戰略天才。所以後來我在前線聽到人們對它加以「鐵軍」的徽號，並不足怪。

正像「紅軍」其他領袖一樣，林彪的足跡也從未出國門一步，而且只懂得中國

語文。但是，不到三十歲的他，名氣已經傳遍了中外。他在中國共產黨軍事雜誌如「E爭」(Struggle)及「戰爭與革命」(War and Revolution)上所發表的論文，曾轉載於中國、日本、及蘇聯等國的軍事刊物上，有許多人加以研究和批評。他被稱為「短促突擊」戰略的發明家，這種戰略是馮玉祥將軍所極其稱道的。第一軍團的許多次勝利，據說都應該歸功於這種戰略的巧妙運用。

有一天早晨，我同着林校長和「紅大」的教職員們走到保安縣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我們到的時候正在運動時間。有些學員在兩個籃球場上拍籃球，有些在黃河邊一塊空場上拍網球，有些在他們原始的「娛樂室」裏拍乒乓、寫文章、讀新書報或做研究工作。

這是「紅大」的第一組，約有學員二百名。「紅大」共分四組，全校學生約計八百餘名。此外，在保安附近同受「教育人民委員會」管理的，尚有無線電、騎兵、農業、及醫藥訓練等學校。此外尚有一個「共產黨工作人員養成所」和「民衆教育工作者人

員養成所」。(Mass-Education Training Center)

聽我演講「英美政策」的學員，共有二百餘人。我大致講述了英美態度之後，就應允他們提出問題來解答。我立刻發現我錯誤了，那餐掛鈔萬萬抵償不了我的窘境。這些要我解答的問題，即使淵博如威爾斯(H.G. Wells)亦將難以應付。例如下面這幾個使我狼狽的問題，你們可有什麼辦法來解答？

「英國政府對於黨察政治委員會的成立，及日軍駐紮華北，持什麼態度？」

「美國的復興運動有什麼結果？對於勞動階級有何利益？」

「日本如果對華開戰，德意兩國會否幫助日本？」

「中日戰爭一旦爆發，日本若無他國之助，能夠支持多少長久？」

「國聯是為什麼失敗的？」

「共產黨在英美兩國，既為合法政黨，為什麼兩國都沒有工人政府？」

「英國反法西斯陣線的成立，有如何進步？美國又有如何進步？」

「國際學生運動的中心在巴黎，其將來如何？」

「在你看來，李滋羅斯之訪問日本，在英日協定上，能否影響對華政策？」

「中國開始抵抗日本時，英美助華呢助日呢？」

「英美兩國既為中國人民之友，請問為什麼還在中國駐紮兵艦和軍隊？」

「英美工人對於蘇聯作如何看法？」

這許多困難問題，要想在兩小時以內回答清楚，無論有天大本領，也是辦不到的。我在早上十點鐘講起，一直到下午很遲的時候還沒有講完，結果只好不了了之，仍無解決而散。

後來我又參觀各教室，並與林彪及其他教職員談話。他們告訴我一些該校的入學條件，並且給我看各組課程表，這些章程曾經印了許多份暗下分送於中國各處。『凡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決心並能獻身於革命者，不分階級，不論政見』，皆得入該校任何一組受學。年齡限制自十六歲至二十八歲，並且『不分性別。』『報名者

須體格強健，並無傳染病及一切惡習。」

我發現實際上第一組的學員，多數是「紅軍」營長、團長、師長、或政治委員之欲受高級軍事訓練及政治訓練者。授課時間共計四個月。按照「紅軍」章程，凡現任軍事長官或政治長官，每從事實際工作兩年，至少必須在「紅軍」大學中受訓四個月。

第二三組的學員，包括「紅軍」連長、排長、班長、有經驗的戰鬥員、及其他由「中學畢業生（或有同等程度者）、失業教職員、抗日義勇軍、抗日派領袖、工人運動活動分子」等之中所選錄的新生。「紅軍」經過山西的時候，該省中學畢業生之加入他們者，有六十餘人。

第二三組的授課時間，共計六個月。第四組則以「養成工程隊、騎兵隊、及砲兵隊」為主。這裏我又遇到幾個以前做過機器匠和學徒的人。後來當我離開「紅軍」防區的時候，還遇到八個從上海和北平來的新生，乘着運貨汽車來加入「紅大」。林

彪告訴我，現在中國各地報名欲加入「紅大」者，有二千餘人之多，不過當時交通實成問題，因為每個學員，都要化裝以後才能混進來。

「紅大」的學程，各組不同，茲姑舉第一組學員所受的課目於下。政治課程方面，包括：政治智識，中國革命問題，列寧主義及民主政治之史的基礎，日本的政治力及社會力。軍事課程方面，包括：對日戰爭的戰略問題，運動戰（對日），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的發展。

以上各種課程，有幾種有特備的教本。這些教本有許多是在江西印好帶來的，據說當時一家最大的印刷所，僱着八百多個工人。其他課程，則由「紅軍」領袖或黨的領袖口頭演講，他們所用的材料，多採自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經驗，或利用縣政府檔案、公文、及其統計。

看了「紅大」這些課程，對於「共產黨是否真心抗日」這個問題，就可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由此更可看出共黨如何預期並切實準備中國對日「獨立戰」——這戰爭，

他們認為必不可免，除非日本撤退駐在中國廣大區域上的軍隊。

對日戰爭不是一個愉快的期望。有些旅華的外國資本家，且目此種期望為瘋狂之舉。但也有些人坦白承認他們並不苛責中國人，如果當幾百萬中國人民已被日本征服時，不願意一無抵抗就投降，却準備為爭取自由而拼命。

我們相信至少「紅軍」是完全決心抗戰的，並且在戰幕一開的時候，他們必定站在最前線，這不但可從「紅軍」領袖的言論中，「紅軍」大學的實際施教中，及與國民黨組織「聯合陣線」的建議中看出來，並且在深入「蘇區」的宣傳中，也完全表現出來。

負着此種主要教育使命的是一「人民抗日劇社」的許多青年隊伍，他們不斷地來往於「紅區」之間，散佈抵抗種子，促醒農民階級消沉的民族主義。

當我第一次參觀「紅軍」大學之後不久，剛巧遇到這個驚人的劇社一次上演。

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劇

當我同那位邀我去參觀人民抗日劇社演劇的青年軍官一報出發時，人們已經排倒海地向一座由古廟臨時改造的露天舞臺湧來。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離開太陽下山還有兩三個鐘頭，保安全城的人，幾乎都到這裏來了。

學員、驢夫、軍服廠和鞋廠的女工、合作社和郵局的職員、兵士、木匠、以及攜兒抱女的村夫，都排山倒海似的向河畔一塊大草場上正在演戲的地方走來。像這樣一個與民同樂的大集會，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甚至在附近網球場上吃草的幾隻山羊，也在那裏湊熱鬧。

這裏既不會票，又無所謂包廂，更沒有特別優待的座位。我看見「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會主席林伯渠、「蘇府」主席毛澤東、及其他官員和眷屬，散處在人羣之間，像其餘人民一樣坐在草地上，並沒

有人特別注意他們。不久戲劇就開始了。

舞臺前面，排着一幅粉紅色的綢幕，上面寫着「人民抗日劇社」六個大字，並且注着「紅軍」為促進民衆教育而提倡的拉丁注音字母。全部節目，一共演了三小時，其中包含唱歌、跳舞、短劇、啞戲等各種花樣，而其中心思想則不外抗日與革命兩者。劇情完全是宣傳性質，一些也不曲折難解，服裝道具又不十分考究。他們不用鑼鼓鏡鈸，不男扮女裝，他們所表演的材料，都是眼前的活的事實，不像中國舊劇那樣專演毫無意義的歷史陳蹟。

一紅軍所表演的戲劇，雖然缺乏迂回曲折的情節和精煉純熟的技巧，但這種闕憾，却有大刀闊斧的活力、滑稽突梯的表演，以及演員與聽衆打成一片的共鳴來補償。凡到一紅色劇場一來的聽衆，的確確傾聽着台上所表演的戲劇，這與中國舊劇的聽衆，截然不同，因為去聽京戲的人，時間多來消耗於吃水果、嗑瓜子、談閒天、揩面巾，從這個座位走到那個座位，只有偶而望一望戲台。

這裏所表演的第一齣短劇，名為「侵略」。開幕時看見一九三一年滿洲一個鄉村的情景，日本人到來逐出那批不抵抗的中國兵。第二幕表演日本軍官在一個農人家裏飲酒作樂，用中國人作坐椅，醉態朦朧地玩弄農民的妻子。還有一幕表演日本小販沿街出賣嗎啡和海洛英，並且強迫每個農民都買些。有一個青年不肯買，就被拖去嚴刑拷問。

「你不買嗎啡，你不服從『滿洲國』衛生條例，你不愛你的溥儀天皇！」那個拷打的人說，「是惡棍，你是抗日匪！」於是青年就即刻被鎗斃。

接着的一幕是鄉村市集的情形，有許多小商人在那裏和平地售物，突然之間日本兵來搜索「抗日匪」。他們向商人索着護照，那些忘記帶來的人就被鎗殺。有兩個日本軍官奪去了肉攤上一塊豬肉。攤販向他們要錢，他們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他說：「你要錢？哼！我們拿了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和華北，也不會付過一個銅子兒。拿你一塊小肉你敢向我們要錢？」他們要加他一個「匪徒」的頭銜。

最後，這當然是村民所不能忍耐的。商人推開了攤頭和雨傘，農民拿起了鋤頭和槍，婦孺帶着小刀都奔過來高喊「打死東洋鬼子」！

這齣短劇穿插着許多滑稽和土話。聽衆咒恨日本人的緊張情緒。往往被轟笑聲所打斷。他們的確受到了十二分的煽動。這戲對於他們並不是一種政治宣傳，也並不是一種僅以激動聽衆感動爲能事的戲劇，而是沉痛的真理。那些被戲劇本意所潛移默化的看着，幾乎完全忘了台上的演員是十幾歲的青年，是晉陝的本地人。

這種描寫，雖然是種趣劇，但是埋在後面沉痛現實，並未被滑稽打渾的小聰明所遮沒，至少一個青年士兵深深地被這種現實所感動。他在閉幕的時候就立起來用情緒堅張的聲音高喊：「打死日匪！打倒屠殺我們中國人的劊子手！打回老家去！」全個羣衆使勁反應着他的口號。我探聽旁人，才知道這孩子是東北人，他的父親就是被日本人所殺掉的。

正在這個時候，幾隻頑皮的山羊打破了緊張空氣。牠們被人發見正在靜悄悄地

吃着網球場上忘記收下的球綫。聽衆立時爆發一個哄堂大笑，急得那班學生趕緊去追牠們，搶救體育部的這件重要財產。

第二個節目是抗日劇社十二個女子的跳舞。她們赤着腳穿着農民穿的籠褲和布衫，面上蒙着輕紗，頭上結着緞帶，表演得非常和諧優美。我探聽得其中兩個女子是隨着「紅軍」大隊從江西走到這裏的，她們曾在瑞金的一「紅軍戲劇學院」中學過跳舞。她們具有優美的天才。

還有一個出色的節目，叫做「聯合陣線舞」，描寫中國抗日總動員。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變出這許多服裝來的，但見一羣青年最初扮着騎兵隊，後來扮着空軍隊，步兵隊，最後扮着海軍，穿了水手的白短衫大腳管褲，戴上海軍帽。他們的手勢和姿勢——中國藝員所天賦的——極其切合跳舞所表演的精神。接着來了一幕「紅機械舞」。利用聲音和姿勢，交織着臂、腿、頭的動作，一羣小跳舞家非常相像地模倣活塞的推動，輪齒的轉轆，發動機的叫哨，和未來機械時代中國的象徵。

在一幕完畢一幕未開的時間，聽衆常常發出情不自禁的叫聲。有六個陝西本地女子——工廠中的女工——被羣衆要求唱一曲本省民歌，由一個陝西農民操弦伴奏。有一個學員也被他們慫恿着來一下客串，他登台演奏口琴，還有一個學員唱一支南方名曲。後來他們又要求到我，堅持要「外國新聞記者」來個獨唱，這真弄得我走頭無路！

他們無論如何不肯原諒我。可恨我除狐步舞曲、華爾滋曲、「波希米亞」、「婀娜瑪麗亞」以外，一無所知，而這種歌曲對於像這樣熱誠的聽衆又不適宜。我甚至連「馬賽曲」都記不起來。但是他們依然極力慫恿着。最後我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唱了一曲「盪鞦韆」，他們總算很客氣，沒有要求最來一個。

當我看到節目單翻到另一幕的時候，我深慶得了解救，這一齣是含着革命思想的社會劇痛寫一個賬房先生與其地主太太戀愛的故事。接着又表演一些跳舞，「活動新聞」報告西南最近消息，及兒童合唱國際歌。唱國際歌時，台中樹着一枝彩柱

，掛着幾面國旗，最初兒童伏在彩柱的四周，歌聲起時，他們一些些立起來，唱到最後大家都舉起了拳頭。

戲劇表演完了以後，我的胸中依舊留着好奇心。所以第二天我就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導演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是河南人，生於一九〇七年，加入共產黨已有十年的歷史。本來她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擔任宣傳工作，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立後，她便和其他青年學生跑到漢口加入共黨。一九二九年共黨派她到歐洲遊學，在法留了一些時候，即赴莫斯科，一年後又回中國，並且通過了國軍的封鎖線安抵瑞金，在那裏開始工作。

她告訴我一些紅色劇社的歷史。戲劇團體大概在一九三一年誕生於江西。當時有個著名的高爾基學校，校址設於瑞金，從「蘇區」各地招收的學生，約計一千餘名，據危女士說，其中訓練的劇團有六十個左右。他們在鄉村中和前線上遊行表演，每個劇團都異常忙碌，往往有許多的「蘇區」鄉村等着他們去演戲。農民們因為老

是感到文化恐慌，所以常常備着舟車，住宿來歡迎他們去。

在南方的時候，危女士還是一個助理導演，到了西北，她便主持整個戲劇組織的事務。從江西長征到西北，歷盡千山萬水依舊生存的一蘇維埃一婦女，不過幾十人，而她便是其中的一個。在南方一紅軍一未到西北之前，陝西早已有不少戲劇團體，但自江西新人才到了以後，戲劇藝術顯然注入了新生命。據危女士說，像這樣的遊行劇社，現在陝西已有三十幾個，甘肅亦復不少。後來我在旅途中也遇到許多。

危女士又說：「每一一紅軍一有個劇社，每一一蘇區一也差不多有一個。演員幾乎全在當地招募，至於從南方來的有經驗演員，現在大都成爲教師了。」

我遇到幾個曾經長征的少年先鋒隊，他們雖然只有十幾歲，却在各鄉村担任着組織和訓練兒童劇社的工作，

危女士很驕傲的告訴我：「農民們往往老遠跑來看我們的戲。有時當我們在離

聞國軍防區邊境不遠的時候，國軍士兵就偷偷地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區市鎮上去演戲，我們演戲時「紅軍」士兵和國軍士兵便把鎗械放脫到市鎮裏來看我們表演。但國軍高級軍官絕對禁止此事，因為一旦看了我們的表演，許多國軍士兵統不願意再與「紅軍」作戰了！

然而這些劇社足以使我驚奇不止的，並不在於他們貢獻於世的藝術價值——實際他們在藝術上並無重要貢獻——而是在於以這樣少的設備却能迎合廣大的社會需要。他們所有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是用這些草率的材料，他們却能發揮偉大的戲劇效果。演員們只得到衣食和極少的津貼，然而他們却能像其他共黨員一樣肯每日研究，並且深信自己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工作。他們到處會睡覺，隨便什麼淡薄的東西都會吃，從這一村到那一村無論怎樣遠的路程都會走。從物質享受的觀點看來，他們無疑地是世界上報酬最少的劇人，但我似乎從來沒有看見更比他們快樂的人。

「紅軍」所用的劇本和歌曲，幾乎全是他們自己著作的。有些由多才多藝的軍官所寫，但大多數由宣傳部的小說作家和文藝家供給。有幾節劇本，出於三年以前加入「紅軍」的文藝批評大家成仿吾之手，有幾篇較近的，出於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之手，她現在也和「紅軍」在一起了。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紅軍」遊行劇團是最具威力的武器，而且也最足感動人心。藉着時常更動的節目，和幾乎每日變換的「活動新聞」的穿插，凡是軍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各種新問題，都變為戲劇的材料。不懂的農民如有懷疑和問題，就用滑稽的和淺近易懂的方法在戲中加以答覆。「紅軍」佔領新區域時，遊行劇團便來鎮定人民的恐懼，給他們一些粗淺的共產綱領觀念，大量灌注革命思想和反宣傳，藉以獲得人民的信任。例如最近「紅軍」攻入山西的時候，許多農民聽到「紅色」演員和軍隊同來，便成羣結隊來看他們表演，自願接受寓觀念於戲劇形式的宣傳。

他們把藝術的宣傳作用發揮到最高的程度，但是有許多人會問：「爲什麼把藝術納入宣傳之中呢？」從廣義方面言，宣傳就是藝術，因爲宣傳把生活的幻象傳達於觀衆，宣傳之所以成爲真實的藝術，由於宣傳所用的活材料及其所申訴的活人，在接觸生活問題時也是真實的。對於中國的民衆藝術與宣傳之間，並無精密的分別，唯一不同者，在於可懂的人生經驗與不可懂的人生經驗而已。

從某種意義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你可以當作一種大宣傳遊行看。他們之保衛某種思想，無異保衛其生存權。我相信「紅軍」即使結果被打敗而瓦解，亦必以此爲其最永久的任務。對於千千萬萬的青年農民之已受馬克斯主義宣傳者，要用舊方法來肅清他們的思想，必無效力。凡是一「紅軍」所到的地方，他們迫切要求徹底的社會改革，而且將新信仰帶給家人和被壓迫者——凡此種種都是用宣傳方法灌輸給他們。

無論他們所犯的錯誤有時如何鉅大，過分行爲如何淒慘，掀此抑彼如何囂張，

但是宣傳的赤誠目的，却在於震撼千百萬中國農村人民，使其負擔在社會上應負的責任，覺醒他們信仰人權，力敵道教與孔教的懼怯、馴從、習靜的信心，教育、覺導、有時包圍，強迫他們爲「民治」——農材中的一個新理想——而鬥爭，爲共黨目光中的正義、平等、自由的生活和人類尊嚴而鬥爭。這種日見增長的要求，經過二千年的長眠，已在農民層中逐漸覺醒起來，將來促成古國大改變的實現的，容或總賴此種要求。

這種「共產主義」所成就者，在於千百個智識青年，受了科學洗禮的激動，抱着偉大的夢想，在歷史上第一次「深入民間」，回到阡陌交錯的鄉村，把他們新得的學問，啓發智識程度低劣，過着黑暗生活的農民，以求與他們攜手建立更豐富的生活。他們深信更好的世界能夠造成功，而且相信唯有他們能夠造出更好的世界，所以回到民間去去取得同情與擁護，成了他們的口號，和「蘇區」社會的理想。而他們居然達到驚人的程度。藉着宣傳和行動，他們把一個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新觀

念帶給了千千萬萬的人民。

我在「紅軍」之中，常懷一個奇怪的感覺，好像我處身於一羣天真熱情的學生之間，他們過着激烈粗暴的生活，因為歷史造成他們這種生活比那足球、課本、戀愛、以及其他國家青年目為大事的更加重要。我有時幾乎不相信像這樣一羣青年，只有一些思想的武裝，却能領導民衆與國軍周旋達十年之久。他們怎樣能夠起來的，怎樣能夠團結的？他們的力量從何而來的？這種少年氣概爲什麼像十字軍那樣永遠蓬勃不衰的？

這些問題，只有當你明白了近三十年來中國歷史所孕育的胚胎，方能解答；這個胚胎的必然產物顯然就是「紅軍」。幾千年來，中國的文人高處於人民之上，成爲統治民衆的官僚階級，他們死守着歷代相傳的成規和稀少的智識，作爲治理愚民的武器，永遠不肯爲之啓蒙。但是新胚胎却產生了一個寧馨兒，他把智識分給平民，甚至想醇化他們。

我在保安的時候，常常猶疑，究竟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解釋中國的新胞胎裏在騷動的胚珠。如何描寫逐漸的發育，痛苦的降生，和出世的新嬰？我只能把歷史事實坦白地說出來，却不能描述人們身受的痛苦於萬一。後來毛澤東告訴了我他自己的歷史，當我夜夜記下來的時候，我覺得這不僅是他的自傳，簡直是一部共產主義在中國如何發育生長，和爲什麼能夠獲得千百青年男女擁護的記錄。（譯者按：斯諾所著「毛澤東自傳」，已載文摘戰時旬刊。黎明書局有單行本出版。）

「小鬼」——少年先鋒隊

有天早晨，我爬上豫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牆，從城頭上望下去，可以看到三丈下面，許多人在熱心地做着工作。原來他們正在拆城牆。一大段城已被拆除，這大概可算「紅軍」的一件破壞工作。城牆對於像「紅軍」那樣的游擊戰士是種障礙物，因為他們習於在空曠場所與敵作戰，如果在空曠場所打敗了，他們並不把軍士浪費於守住一座孤城，在那裏陷於被包圍和肅清的危險，却是趕緊引退，讓敵軍來自己走進去，要是敵軍願意的話。無論如何，殘破的城牆自可使他們在反攻時減輕許多工作。

我在有雉堞的城頭上兜了半個圈子，遇到一隊號兵。我聽到軍號不斷地吹響已有好幾天，今天却看到那吹號的人了。他們却是少年先鋒隊，沒有一個不是兒童，我帶着父執輩的態度止住一個人與他談話。他穿着網球鞋，灰色短衫，稷色的青灰

軍帽，上面釘着一顆紅星。但在軍帽之下的號兵，却一些也沒有褪色；他的臉色紅潤，眼珠發光，遇到這樣一個孩子，你的心裏自然而然會得發出同情之感，就好像你遇到一個需要慈愛和朋友的勇敢迷途兒！我想，他一定是多麼想念家鄉呀！但我的幻想立刻被打消了。他不是一個要媽媽的孩子，而已經是個老練的「紅」兵，他告訴我他的年紀是十五歲，四年以前在南方加入「紅軍」。

「四年了！」我不相信地叫起來，「那麼你是在十一歲時就加入「紅軍」了？難道你也是參加長征的？」

「不差」，他很誇耀的回答，「我當「紅軍」有四年了」。

「你是爲什麼加入的？」我問。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我常常到山上去斫樹木，冬天就到那裏拾樹皮。我時常聽到鄉下人講「紅軍」，他們都說「紅軍」是幫助窮人的，這使我很高興。我們家裏很窮。我們一共有六個人：爸爸、媽媽、三個哥哥、和我。我們的收成，一半多

要付地租，所以我們常感不足。冬天我們燒樹皮做湯吃，把穀子省下來留作春天下種。我永遠沒有吃飽過。

「有一年，「紅軍」到了離漳州很近的地方，我爬過山頭要求他們幫助我家，因為我們很窮。他們待我非常好，送我到學校裏念了一些時候書，我吃得很快。幾個月以後，「紅軍」奪了漳州，並且到了我的家鄉。所有地主、官吏、和債主都被趕跑了。我的家裏有了土地，不必再向收稅者和地主納租賦。他們很快樂，而且很稱贊我。我的兩個哥哥也加入了「紅軍」。」

「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不知道。當我離開江西的時候，他們和「紅軍」還在福建，他們跟方志敏在一塊兒。現在我可不知道他們。」

「農民喜歡「紅軍」不？」

「嘿，喜歡「紅軍」？當然是喜歡的。「紅軍」給他們土地，並且趕跑了地主

，收稅者，和剝削者」，（這些小鬼都知道馬克斯主義的術語！）

「但你怎樣知道他們是真正喜歡「紅軍」的？」

「他們自己親手給我們做一千一萬的草鞋。女人給我們縫制服，男人給我們探敵情。每家人家把兒子送來當「紅軍」。老百姓就是這樣待我們的！」

我不必再問他是不是喜歡他的同志：沒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會得和他所恨的軍隊，同走二萬五千里長路。

「紅軍」之中像這樣的少年，不知有多少。這些「少年先鋒隊」，由「共產黨青年團」組織起來，據C. Y. 書記方文平說，「少年先鋒隊」和「共產黨青年團」在西北「蘇區」共有四萬人。隨着「紅軍」的，一定也有不少，因為凡在「紅軍」駐紮的地方，必有一個「少年先鋒隊」組織的「模範營」。他們都是十二歲到十七歲（照實足年齡算起來只有十一歲到十六歲）的少年，而且是從中國各地集合攏來的。他們之中，有許多像這個小號兵一樣，從南方歷盡長征時千山萬水的勞苦。有許

多却在「紅軍」入山西時加入的。

少年先鋒隊的工作是做傳令兵、勤務兵、號兵、偵探、無線電員、挑水伕、宣傳員、演劇員、馬伕、看護、幹事、甚至教員！有次我看見這樣一個小鬼站在一幅大地圖前面，對着一班新兵在講世界地理。我在第一軍的劇社中，又看到二個生平所見最嫺雅的小舞蹈家也是少年先鋒隊隊員，並且也是從江西跋涉而來的。

你一定會驚奇他們如何能夠忍受這樣的一種生活。死亡和被殺的必有好幾百。因為做偵探或宣傳工作而被捕關在西安醜惡的監牢中者，或因追不上大軍而迷途失散者，約有二百人以上。但是他的剛毅果敢是驚人的，他們對「紅軍」的忠心是深切的。

他們大多數穿着比他們身體還大的制服，往往袖子垂到兩膝，上衣拖到腳跟。他們自己說一天把手臉洗三次，但他們老是很髒，鼻子常流鼻涕，流得太長時又常用袖口來揩拭而發出強笑。但是他們有他們的世界：每天都能吃飽，每人都有一條

棉毯，領袖甚至還佩有手鎗，他們繫着紅布條，戴着凹頂的小帽，雖然老是比頭大，但總釘着一紅顆星。他們的來歷往往不明：有許多記不起他們的父母，有許多從做學徒的店舖子裏逃出來，有些做過奴隸，大多數從人口太多養不活他們的家庭裏跑出來，而全體都是自己決心加入，有時成羣結隊加入「紅軍」的。

他們創造了許多勇敢的故事。比他們年長的同志們，從不把他們當作小孩子看，有許多還實地上過戰場打仗。他們說，在江西「紅軍」主力撤退的時候，許多「少年先鋒隊」和「共產黨青年團」同着游擊隊一道打仗，甚至還參加肉搏戰——所以國軍士兵笑說，他們可以出其不意奪下他們的刺刀將他們推入戰壕中，因為他們實在太小太輕了。蔣委員長在江西所設的感化學校中，有許多被俘的「紅軍」便是從十歲到十五歲的少年。

「先鋒隊」之所以喜歡「紅軍」，大概因為在「紅軍」隊裏，他們才第一次被當作人看待。他們所吃的食物和所過的生活，像他人一樣；他們參加各種事情；他

們自視任何人都及他們不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受過鞭撻或恫嚇。他們雖然被「利用」爲傳令兵和勤務兵——不知道有多少重要的命令是由「少軍先鋒隊」從上峯傳遞到目的地的——但他們也有自己活動的自由，有保護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學習遊戲和運動，他們受有粗淺的智識，他獲得簡單的馬克斯主義口號的信心——這種口號大多數極其簡單，使他們一望而知，如打死地主和學徒的師傅等等。無論如何，這要比在師傅硬板檯上一天工作十四小時，自己雖然有得吃而母親夜飯碗還是空着總好些。

我記起有這樣一個逃亡的學徒，是我在甘肅遇到的，人家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山西娃娃」。他曾經被賣給山西洪洞縣附近一個小鎮的舖子裏，「紅軍」到來時，他偷出城牆和三個其他學徒一同加入。他怎樣決心隸屬「紅軍」，我雖不知道，但是山西當局的一切反共宣傳，年長者的一切警告，顯然產生了相反的效力。他是一個面孔像洋囡囡一樣的胖孩子，而且只有十二歲，但是他已經能夠照顧自己，這在

他經過山西、陝西、而達甘肅的行軍中完全可以證明。我問他爲什麼加入「紅軍」，他就回答：「「紅軍」是爲窮人而戰的。「紅軍」是抗日的。爲什麼人人不要當「紅」兵呢？」

又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削少年，他是正在甘肅河運灣附近後方醫院中服務的「少年先鋒隊」和「共產黨青年團」頭領。他的老家在江西共黨模範縣與國，他說他的一個弟兄至今還在那裏當游擊隊，他的姊妹在那裏當看護。他不知道現在家中情形怎樣了。不差，他們都喜歡「紅軍」，爲什麼呢？因爲「大家都知道「紅軍」是我們的軍隊——是爲無產階級而戰的。」我不知道究竟這次長征西北對於這個少年心裏有些什麼印象，我始終想不出來。在他看來，徒步走過兩倍於美國東西之間的距離，只是一件小事情而已。

「你在長征的時候，感到痛苦嗎？」我大胆地問。

「沒有痛苦，沒有痛苦。如果有同志跟在一起走，你就不會感覺到痛苦。我們

革命青年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艱難或痛苦；我們只知道當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也走！」

「那麼你喜歡甘肅嗎？甘肅比江西好呢比江西壞？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是好的。甘肅也是好的。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什麼東西和睡在什麼地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我想那是練習簿在回答我的。他不過是從「紅色」宣傳員學得答覆的一個孩子。但是第二天我却吃了一大驚，原來「紅軍」士兵在開民衆大會的時候，我看見他是主要演講員的一個，而且是個自己發表意見的「宣傳員」。他們告訴我，他是軍隊裏最好的演講員之一，他在那次大會中，用簡單明確的解釋說明了，目前的政治局面，以及「紅軍」爲什麼要停止內戰和一切抗日軍隊組成「聯合陣線」的理由。

我又遇到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他曾經在上海一家機器店裏當過學徒，和三個同伴經過種種困難而到達西北。當我會見他的時候，他在保安無線電學校中做學生。

我問他是不是有些留戀上海，他說不，他在上海並沒有留下什麼，他在上海所鬧唯一的笑話是望着櫃窗裏面好吃的東西——這種東西當然是他買不起的。

我在保安最喜歡的一「小鬼」是個「外交部」交通科主任李可農的傳令兵。他是個十三四歲的山西人他怎樣加入「紅軍」我可不清楚。他是少年先鋒隊的隊長，他以極端嚴肅的精神做他的職務。他不知道從那裏得來一條三角皮帶，穿着一套合身的清潔小制服戴着一頂挺括的圓頂帽。在他的領頭裏面襯着一條白襯領露出潔白的一條縫在外面。他是全城最清潔的一個士兵。如果毛澤東立在他的旁邊，一定相形見拙了。

但是這個娃娃的名字，他的父母不知爲什麼給他取個常繼班。別的錯處倒沒有，只是一「繼班」兩字的發音，和「鷄巴」很相像，因此人家都叫他「鷄巴」——北方人稱男子生殖器的別名。有一天，常繼班帶着平常一樣的尊嚴態度走進我所住的「個」外交部「小房間裏，很響的並擺足跟，對我行個我在特區裏從未見過最榮敬

的普魯士式軍禮，並且稱我為「史諾同志」。然後他放了局促不安的心情。他的來意我很明白，就是他的名字非為「鷄巴」而為「繼班」，因為這兩個名詞之間變得很大。他把他的名字很仔細的寫在一張小紙頭上，拿來放在我的面前。

我吃了一大驚，用嚴重的態度回答他說，我從來不叫他「繼班」以外的名字。我一半等待他大概要和我挑戰了。

但他謝謝我，恭敬地鞠了一個躬，又對我行個謙遜絕倫的敬禮。他說「我要提醒你，當你在外國報紙上講到我時，千萬請你不要弄錯我的名字。外國同志如果看到一個紅色戰士的名字叫做「鷄巴」，那就要給他一個壞印象。我到如今才提起繼班，本來我並沒有意思把他的名字放到我這本奇書中，但他既然提醒了我，我也不妨把他與總司令並傳。

「少年先鋒隊」在「蘇區」中的還有一個任務是在前線後面的路上檢查行人有無「路條」。他們執行這個任務很認真，無論何人凡是不帶「路條」的，便要送到

當地「蘇維埃」去盤問。彭德懷告訴我，有一次他曾經被幾個「少年先鋒隊」阻住問他要「路條」並且恐嚇着要逮捕他。

「但我是彭德懷」他說「這些路條就是我自己簽字發出來的」。

「即使你是朱德總司令，我們也不管。」那些年青的懷疑家說，「你要通過這裏必須有路條。」他們吹着哨子喊同伴來幫助，就有幾個孩子從田間跑來加入他們。

結果彭德懷只好自己來寫路條，簽上了字，被他們允許通過。

照這樣看來可知這些小鬼的確不錯，他們的精神是偉大的。我想年紀大一些的人看到了他們一定會得忘却悲觀，立刻會得想到他必須為他們這樣孩子的將來而鬥爭。無論他們一天行軍怎麼吃力，當人家問起你好不好的時候，他們總是用愉快樂觀的口氣回答一聲「好」！他們能夠吃苦，耐勞，勤勉，活潑，並且熱心於學習，看了他們你會覺得中國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少年沒有希望時，一個國家才真正沒有希望了。中國的將來就寄託在「先鋒隊」身上，假如這種少年能夠解放，形成，覺

醒，給他一個建造新世界的地位。我說這些話也許會蒙過譽之嫌，但是能夠親眼看到這些英雄少年生活的人沒有一個會不覺得中國人並非生來就腐化而的確也有可造之才。

紅軍戰鬥員的生活

中國兵在國外的名氣很不好聽。許多人都以為他的鎗只是裝飾品，拿起鴉片烟鎗才是真正的打仗，兩軍對立時，經過互相約定以後才開鎗，而子彈又是朝天放，打仗的目的，無非爲了錢。不但如此，並且用鴉片當錢付薪水。這種情形過去大多數的中國軍隊，的確有些，但是現代第一等的中國兵，却並不如此，這是他們現在可以表現給全世界看的。中國之不能打敗日本，目前尚未達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因爲除了淞滬戰爭外，到現在還沒有展開一次更猛烈抵抗戰（按此文作於八一三以前）

中國現在固然還有許多腐敗的軍隊，但是近幾年來，已經產生了新式的戰士，不久必可起而代之。這十年之中的內戰，不謂不費錢也不能說不劇烈，有時雙方往往並無軍營和遮蔽而陷於苦戰，雖然到頭來一無結果，但在歷次戰爭經驗中，却產生了運用近代戰術與戰略的軍事領袖和戰鬥力，足使將來造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

「雪從前被譏爲「鉛兵」的恥辱。

中國軍隊的癥結不在於其士兵的本身。就我在一二八淞滬之戰所見，中國兵的戰鬥能力，並不亞於世界其他民族。軍械欠良，姑不具論，指導士兵的將領，能力實在太差，他們不能訓練士兵有很好的軍紀，有政治的認識，有必勝的決心。但是「紅軍」却能一洗這種缺點。在兩軍對陣時，只有他們認識他們是有所爲而戰的。他們之所以能從容應付軍械和軍隊遠較他們優越的敵軍者，完全得力於士兵的教育。

組成「紅軍」一大部份的中國農民，是所向無敵的，因爲他們能夠克苦耐勞，一無怨言。這種精神不但已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完全表現出來，並且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來。外國軍隊容或能夠忍受同樣的粗衣惡食繼續不懈而生存，但我却從未見過。我知道英美法日德意的軍隊很清楚，然而我相信只有最精良的部隊始克忍受「紅軍」那樣的日常困苦生活。

我在雷夏和甘肅親眼看見「紅軍」住宿在從前有錢地主作爲馬廄的窰房裏，很迅速地用泥土木材築起防禦工程，有些住在從前官吏或駐軍所棄去的場地或房子裏。他們睡在堅硬坑上，甚至連草氈都沒有墊，每個人只蓋一條棉毯——但是房間裏却收拾得很清潔，很有秩序，雖然地皮，牆壁，和天花板都是用泥土做的。他們很少有桌子或寫字檯，把磚石堆起來就當作椅子，因爲大部份的傢具在對方軍隊撤退以前都被破壞或搬走了。

每一營都有自己的伙食夫和軍需員。「紅軍」的伙食極其簡單。咖啡，茶葉，各種糕餅，糖食或鮮菜，他們很少吃到，但也並不絕對拚絕。他們把咖啡罐頭看得比咖啡更有價值，因爲沒有一個人愛喝咖啡，那喝起來就像吃藥一樣苦，但是罐頭却可用來盛水。開水是他們唯一的飲料，冷水是絕對禁喝的。

「紅軍」士兵在打仗的時候，每日也是很忙碌。事實上他們在西北正像在南方一樣，都有很長的休戰時間。「紅軍」每佔領一個新區域，總要住下一兩個月來

做組織民衆的工作，只有極少數兵力担任前哨任務。

「紅軍」士兵不在壕溝或探哨的時候，過着很有規律的生活。他們五點鐘起身，九點鐘睡覺。一天的生活程序如下：起身後早操一小時，早膳，軍操二小時，政治演講及討論兩小時，午膳，休息一小時，識字兩小時，運動遊戲兩小時，晚膳，唱歌開會，睡覺。

他們竭力提倡跳遠，跳高，賽跑，爬牆，攀繩，滑繩，擲手榴彈，打靶等比賽。看了他們爬牆，翻牆，攀繩的矯捷身子，無怪乎中國報取他們一個「人猿」的綽號，因為他們對於爬山越嶺和迅速運動的技術特別來得高明。從連到團，凡是田徑賽，軍事操，政治智識，識字，及公共衛生等團體比賽，都有錦標獎賞。我看見各單位的「列寧俱樂部」中，掛着這種得勝的旗幟很多。

每一營和每一團，都設有一所「列寧室」，各種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以爲中心。「團列寧室」可算軍營中最好的了，但好的不在於設備而在於活動的興趣

，因為我所看到的設備，仍舊很不講究。到處都有列寧和馬克斯的像，這種像是由營團裏的圖畫天才自畫的。正像中國人所畫的基督像一樣，他們的面孔被畫成東方人的樣子。眼睛細得像條線，兩隻額角像孔老夫子那樣，或者甚至沒有額角。「紅軍」的士兵稱馬克斯為「馬大鬍子」。他們對他有種親切的敬畏之心。尤其是回族如此，因為他們是中國長着大鬍子的唯一民族。

「列寧室」還有一個特徵，那便是都有着一個用土泥做成的模型來研究戰略的牆角，中國人對於這一套東西是他們的特長。小小的市鎮，山脈，砲台，江河，湖泊，和橋樑都建築在這些牆角，當研究戰略問題時，就用玩具兵打來打去。有時可以看到上海的中日之戰，有時可以看到長城邊上的中日之戰。這些模型有時也用來解釋駐軍區域的地理情形，表演假戰的戰略，或僅教授地理課和政治課，作為士兵軍事訓練的一部份。我在醫務營的列寧室中還看見陳列着人體剖解泥模表示各種疾病的影響說明身體衛生等等。

「列寧室」的另一角，是專作識字之用，你可以看見每個戰士的練習簿掛在牆上。識字班分三級：一級識字在一百以下一級識字在一百至三百，一級能寫讀三百字以上，每級所用的課本，都是「紅軍」自己印刷的，用政治宣傳作為研究的材料。每一營、團、師、軍、的政治部，負責民衆教育與政治訓練，據說第一軍中不識字的文盲，現在只有百分之二〇。

第二師一個廿二歲的政治指導員夏華告訴我：「『列寧室』的宗旨很簡單。他們的一切生活和活動，必須與士兵的日常工作和發展相配合。這種原必須由士兵本身來實行，必須簡單而明瞭，必須將娛樂與軍隊當前任務的實際教育打成一片。」

每個「列寧室」都有一份壁報，由士兵組織委員會出版，其所載資料，必須較一般「列寧室」所備圖書為新。這種圖書包括審定的教課書和演講集，蘇聯革命史，外界出版的各種雜誌，以及「紅色中華日報」，「黨的工作」，「鬥爭」等「紅

軍」刊物。

讀了「列寧室」的壁報，就可以知道士兵們的問題及其智識程度。我曾經把很多壁報的內容摘要譯錄。這裏我們可舉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在豫旺堡第二師第三團第二營「列寧室」的壁報為例。其中有共產黨和青年團的每日通告及每週通告，兩欄初識字者的投稿——內容多為革命標語和口號——甘肅前方勝利的無線電消息，本週練習的新歌，外界的政治新聞，以及最受人愛讀的紅黑兩組褒貶欄。

在紅欄中所贊揚的，為個人或團體的剛毅、勇敢、為公、勤奮、或其他美德。在黑欄中所指摘的，為同志間及高級人員（姓名公布）所犯的錯誤，如懶於擦鎗，怠於讀書，遺失手榴彈或刺刀，上班時吸煙，「政治意識落伍」，「個人主義」，「反動行為」等等。某次我在黑欄中看到有人攻擊伙食伙把小米飯燒得半生半熟，又一次看到一個伙食伙攻擊某人常常抱怨他的伙食欠好。

許多人都聽到「紅軍」的士兵，很愛好英人玩的乒乓球。每個「列寧室」的中

央都放着一張大乒乓球拍，可當打乒乓球用，又可當飯桌用。在吃飯的時候，「列雷室」就變成了飯廳，往往有四五個人，拿着球拍，球網和乒乓球催促他們的同志趕快喫飯，因為他們等着要拍乒乓球了。每一營都有一個乒乓球選手，我從來打他們不過。

有些「列雷室」還有充公得來的留聲機。有天晚上，他們邀我聽一具美國勝利公司出品的一話盒子，那是從高桂滋將軍那裏得來的「禮物」，當時他正在陝綏邊界指揮國軍與「紅軍」作戰。高將軍的唱片除了兩張是法國片外，其餘都是中國片。一張法片是「馬賽曲」和「鐵不拉來」，還有一張是法國滑稽歌，聽的人雖然不懂得歌詞，但是聽了歌調却都哄堂大笑。

「紅軍」有許多自己發明的遊戲，並且不斷地創出新玩意兒。有個遊戲叫做「識字牌」，是用紙牌來幫助文盲認識基本字的遊戲。還有一個遊戲和撲克很相像，但大牌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革命萬歲」，「蘇維埃萬歲」。

「！等口號，小牌寫着隨政治和軍事目的而改變的口號。他們還有許多團體遊戲。『列甯俱樂部』的游藝節目由共產黨一青年團團員一負責，每天四羣衆歌唱也由他們領導。他們有許多歌詞是配着基督教贊美詩的曲譜唱的。

這一切活動，使「紅軍」的士兵既很忙碌又很康健。就我所見，軍隊裏並沒有營妓。抽鴉片是絕對禁止的。我在路上和「紅軍」過着共同生活的時候，以及我所經歷的任何防禦工事中，並未看到鴉片烟或鴉片烟管。上班時雖不禁吸紙烟，但他們宣傳勿吸，事實上「紅軍」士兵吸紙烟的很少，我敬一支給他們的時候老是被回絕。

「紅軍」正規軍士兵在後方的團體生活便是如此。你看了也許並不興奮，但與宣傳家所說的已大大不同，他們常說「紅軍」士兵的生活非常放浪，往往酗酒鬧事，看裸體女子跳舞作樂，飯前飯後互相爭吵。這種捏造出來的故事純粹是囂語。事實上，一個革命的軍隊，無論在那個國家，都有被人視為放浪形骸的危險。

「紅軍」的那種精神，常爲他軍所模仿，但是他們的「革命意識」，却是他軍所萬萬做效不到的，在這種意識之上，建立着他們的道德要塞。究竟這種意識是什麼東西，最好請看「紅軍」士兵的政治討論會——在那裏你可以聽到這些青年爲之奮鬥爲之捨生的簡單堅定的信條。

保安生活散記

我回到保安，仍舊住在外交部，從九月底起一直到十月半。我所搜集的材料，足可寫一部「中國」赤區名人錄，除了每天早上和一個新領袖談話外，我就像過着假期生活：騎馬、洗浴、打網球。那裏有兩個網球場：一個是草地，在抗日大學附近，一個是泥地，在前「西北分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住宅隔壁。每天早晨太陽一起來，我就和抗日大學三個教職員打網球：一個是德國人李德，一個是蔡委員，一個是吳委員。場上有很多石子，要回急球很困難，但我們依舊打得很起勁。蔡和吳對李德講俄國話，因為他的中國話只能講零碎幾句，我對李德講英語，對蔡吳講中國話，所以我們好像玩着三國語言的遊戲。

我給他們一個更腐敗的影響是我的賭博俱樂部。我原帶着一副撲克牌，到這裏以後從未用過。有一天我拿出來教蔡委員怎樣玩法。蔡在戰場上曾經失去一隻手臂

，但對他打網球和打撲克都沒有大礙。他學會打撲克以後，我常常輸給他。不久打撲克成了大家最愛玩的遊戲。甚至有許多婦女也到我的外交部賭博室裏來。我的土坑成爲保安的羣英大會所，晚上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非夫人，鄧發夫人，毛澤東夫人都會聚在燭光底下，大家笑語喧嘩。

保安名人接受撲克以後，對於「蘇維埃」的道德真是一個大威脅。最初我們以打網球開始，後來就每夜在李德的草舍裏和我的外交部罪藪裏交換着打牌。我們居然把博古，李克農，凱非，洛甫等這樣可敬的公民都拖入這個罪淵中。注數愈來愈大。有一天晚上，獨隻手臂的蔡委員，贏了博古主席十二萬塊錢？看來博古只好侵吞國庫才能還清這筆賭債、結果我們只好這樣解決：規定博古如從庫中取出十二萬塊錢付給蔡，蔡須以該款買飛機來建立「蘇維埃」的空軍。可是這些輸贏都是用火柴來計算的——蔡買的飛機也用火柴！

獨臂蔡是個有趣可愛的漂亮人物，敏於有應對，富於談諧。他加入共產黨已有

十年歷史。當初他是一個湖南的鐵路工人，加入共黨後，被派至莫斯科留學了二三年，在那裏愛上一個俄國同志，並與之結婚。有時他會愁容滿面望望他的空袖管，心想他的女人看見他失去一隻手臂的時候不知會否和他離婚。『不要爲這種小事情而煩惱』，吳教授——也是一個俄國留學生——會得安慰他說：『你看到她的時候只要沒有把子孫袋被人家射去，那你還是幸福的』。但蔡却竭力要求我回到外界的時候，送他一隻假手臂。

這不過是許多不可能的要求之一。陸鼎彝要我以出售共黨照片所得的代價，買一隊飛機，僱一批裝配和駕駛的人員。徐海東要我買一副假牙齒來裝在他的空牙床上。這裏每個人的牙齒都有毛病，他們已經有好幾年請不到一個牙科醫生了。但是他們的堅忍精神是可驚的；你從來不會聽到人有怨言，雖然大多數人都患或輕或重的病痛；有許多受着潰傷，有許多因爲飲食不調而患胃病。

我個人的食物不能算不豐富，每天吃着同樣的東西，雖然使我感到厭惡，但是

胃口却很好。他們給我未曾發過酵的帶糖麵粉做成的糖，烘來吃倒也並不壞，有時我還享受到豬肉或羊肉，此外，我經常靠吃小米過生活——小米粥，小米飯，小米饅頭等。蔬菜很不少，辣椒，蔥蒜，和豆類也多着，我已長久不嘗咖啡，牛油，白糖，牛奶，雞蛋，和其他許多東西，但是因為得不到，也只好吃小米將就。

有一天，圖書館裏到了幾份字林西報，我讀到一篇做朱古力鬆糕方法的文章。我曉得博古在他的草舍裏，藏着一聽可可，我想用些可可再以豬油代替牛油，便能做成那種鬆糕，於是我就請李克農寫一封正式呈文給「西北分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給我二兩可可。過了幾天，並無回音，我想開口又不敢出言，有時懷疑我的做糕手段，有時抱怨繁文縟節和官樣文章的麻煩，最後我們從博古那裏強拿了二兩可可，並從食糧合作社得到其他必需的材料。以我經驗還沒有打好，我的衛兵跑進來考察，這家伙一個不當心把可可傾倒在地上。又經過一番繁文縟節，最後總算把一切都弄舒齊，就開始這件偉大的實驗工作。結果怎樣呢？無論那個聰明人都能料得到。

我這到臨時做成的爐竈有些不靈，糕並不發胖，當我從火上拿開的時候，底下一層已經成爲炭，上面一層仍舊像漿一樣不~~。~~但是外交部的旁觀者，却喫得津津有味，因爲裏面的作料究竟很好，棄去未免可惜。我失了很大的面子，從此以後只好服服帖帖仍舊吃我的小米。

我做朱古力糕雖然失敗，却從李德那裏得到了補償，他請我吃了一次「西餐」。他有時很會想法弄到一些大米和雞蛋，並且因爲是個德國人，還能做德國臘腸。你可以看到那些大臘腸，一串串排在保安大街附近他的門外曬太陽。他已備足一冬的享受。他又自己造一座壁爐，並且教他的中國太太——是他在江西遇到的一個女子——怎樣做醃酵麪包。他給我看做西餐的材料多的是，只是食糧合作社（我們每天的飯都是由合作社燒的）不知道做法而已。合作社的伙食總管是第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的太太——經過長征的唯一小腳女人——我想李德的太太必定和她相熟識。爲什麼他能搜集得到雞蛋和白糖，大概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李德當然不僅是個烹調能手和撲克能手。這個中國「蘇區」的神祕人物究竟是誰？國軍將領羅超英讀了江西得來的他的著作以後稱之爲「紅軍諸葛亮」的，究竟如何重要？他和蘇聯的關係如何？蘇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又如何？

紅軍唯一的外國顧問

在最初五年之中，「紅軍」努力於組織工作，革命動運，和補充實力，在此期內，他們的確沒有一個外國顧問。直到一九三三年，始有一個德國顧問李德到「蘇區」裏來，而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佔着很高的地位，他是同「紅軍」一起作戰的唯一外國人。

李德經過六天六夜冒險的旅程，才到達江西赤都的瑞金，他墜在一隻內河民船的席翰底下，從廣州混進「蘇區」的邊界。在他未到瑞金以前，除了偶而有人混進來以外，「紅軍」與共產國際（Comintern）的唯一接觸，全靠無線電交通。上海有個受共產國際支配的顧問委員會，他們對於「紅軍」有很大的價值，因為靠着他們的無線電，「紅軍」得以知道外界重要的軍政活動。那要比國軍在「蘇區」裏面的間諜組織更有效力得多。

不幸這個顧問委員會和李德，造成了「紅軍」在江西最後時代中二個大錯。其中

一個大錯，正如毛澤東所說，就是不與一九三三年秋在福建起事的十九路軍相聯合。十九路軍曾在蔡廷鍇和蔣光鼐的指揮之下，於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英勇地抵抗過日本的路侵，並且確實表示了抗日革命的特性。自從梅何在塘沽締結協定以後，十九路軍便到福建舉起了反對政府，要求抗日，主張民主政體的旗幟。十九路軍原是要政府遣派到福建來打「紅軍」的，當時不但有人向「紅軍」提議休戰，並且提議根據抗日陣綫而聯合起來。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多數領袖，都同情這些建議。他們準備把主力向福建移動，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盡力援助十九路軍，以便組織聯合政府，共同攻擊國軍，但是共產國際却不知爲什麼緣故，通過上海顧問委員會反對此舉。當時莫斯科承認國民政府不久，蘇聯頗欲對南京表示友好，而托洛斯基派力言共產國際路線的主要原因，在於莫斯科反對擴大規模的內戰，依舊希望「紅軍」與國軍站在同一立場反抗日本，不願在此時蒙受煽動叛亂之嫌，尤其不願「紅軍」在福建取得海口後向蘇聯

要求供給軍火。可是這種意見，並沒有明證。

不過無論謠言怎樣，事實却是：「紅軍」不與十九路軍合作，而把主力撤退到贛西，使國軍得以一鼓將叛亂肅清，「紅軍」却了最有力的可能同盟者。革命的十九路軍既被消滅，打破南方「蘇維埃」的工作就減輕了不少。

第二個嚴重的錯誤是國軍第五次圍剿時戰略的失策。對於以前幾次圍剿，「紅軍」的得勝都靠計略戰(Maneuvering Warfare)的優越，及其迅速集中與出奇襲擊的能力。陣地戰和正規戰都處於次要的地位。但在第五次圍剿時，李德竭力主張改變戰略。他把大規模的防禦放到陣地戰上，視游擊戰與運動戰為附屬工作，不管軍事會議的一致反對而獨行其是。

到現在，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來：李德對於「蘇區」的資源，「紅軍」在固着戰上(Immobilij Warfare)的戰鬥力，以及對方紀律的欠良，大大地估計過甚了，而於國軍機械化部隊及空軍的攻擊力，無可寬恕地估計太低了，對於政治情勢中的重要

因子，在他以為發展開來有利於「紅軍」的，嚴重地估計錯誤了。

但是像李德這樣一個單身的外國人，怎樣能有足夠的影響把他的意志加於整個軍事會議，政府的判斷之上呢？李德無疑是個出色的軍略家和戰略家。在大戰時，他就在德軍中大顯身手；後來又成爲俄國紅軍的師長，並在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因爲是個德國人，「紅軍」又尊重他對於蔣委員長德籍顧問西克特將軍（General Von Seeckt）所出戰略的分析，而事實證明他的料事的確如神。國軍將領發現李德所寫關於他們戰略的解釋，也帶着驚奇的稱贊認爲李德正確料到每次攻擊的步驟。

李德是個抑鬱寡歡的普魯士退職軍官，又是一個聰明博學的布爾希維克。他也騎馬參加「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在一九三〇年對我說，西洋的作戰方法並不永遠適用於中國。他說：「中國人的心理和習慣，與中國人軍事經驗的特性，須在某一情勢之下始能決定主要的戰略。中國同志對於本國革命戰爭的正確戰略，要比我們知

道得多。」他現在的地位雖然降得很低，但是他們忘記了對他過去的一切惡感。

可是爲李德說句公平話，他在江西所負的實際程度，似乎說得太過。他的確是防禦機構中一個重要的部份，沒有他犯錯誤，「紅軍」也許不會把不順利的經驗改正過來。因爲他是一個自負的外國人，他就成了代人受過的綿羊，而把大部份過處推到他身上，似乎可以把事情稍爲平靜下去了。事實上無論在那個天才指揮之下，我們難於相信「紅軍」能夠打破第五次圍剿那一年所遇的天大困難而仍得勝。經驗是個大教訓，而這個教訓對於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會有利益。從此以後，把革命軍的戰略指揮全權交付於一個外國人，這種錯誤大概不會再犯的罷。